

## N 本期聚焦

## 读懂改革开放以来的7次六中全会

## 编者按：

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24日至27日召开，会议将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7次六中全会的主题及特征，并对即将召开的全会作了展望。

张广昭 陈振凯

## 7次六中全会核心议题

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环节。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总共召开了7次六中全会。梳理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7次六中全会主题，主要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

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建国32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986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时期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990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1996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分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2001年9月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阐述了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聚焦社会问题，是基于对当时中国面临的转型矛盾的深刻洞察，是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主义的一次战略谋划。

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强调要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

## 7次六中全会的主题特征

这7次六中全会，其中，有3次研究意识形态问题、3次研究党的建设问题，1次研究社会建设问题。可见，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六中全会的主题特征。

中央全会研究的是党和国家层面的执政方略和治理之道。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党和国家根据治国理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而确定

的。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党建，都是极端重要的课题。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意识形态工作。同样，党的建设问题之所以成为以往六中全会较多涉及的主题，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党，一个实行集中统一坚强领导的党。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换言之，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非常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瞩目的治理成绩，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于中共这个核心力量。能不能治理好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能不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能否持续保持先进性、纯洁性，能否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能否团结全国人民实现有效的治理。

六中全会多次涉及党建主题，正是汲取了近现代政党兴衰的正反经验。纵观世界上治理良善的国家，无不是高度重视执政建设的国家；反观治理无序甚至失败的国家，或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或是政党组织衰败。

## 十八届六中全会展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依法治国，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布局，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恰好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在战略重点与实施战略方面谋篇布局

的强大能力，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治国理政的强大战略思维。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在党内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明确要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出台“八项规定”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对腐败零容忍、打虎拍蝇，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这次六中全会要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反腐治本，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正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国进行深刻变革的重要时刻，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处于关键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正处于紧要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亨廷顿认为，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一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比较、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治党思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执行力强、制度化程度高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N 有此一说

## 地名设置不必以古为尊

王树森

近来社会上关于规范地名的讨论增多。其中一种引人关注的意见，是主张恢复历史地名，比如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前些年用襄阳旧名代替襄樊，更有人呼吁将皖南黄山回改为徽州。

出现这种声音可以理解，因为地名包蕴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承载着朴素的个人及家国记忆。但是，规范地名是否一定意味着使用历史地名为首选？恐也未必。因为影响地名制定或修改的因素很多，如约定俗成的称谓习惯，又如行政区划的调整，再如国家总体形势的发展变迁。如果仅以所谓历史情结决定地名设置，盲目追求以古为尊，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同样会落入另一种误区。

今天陕北有一个佳县，过去叫“葭县”。1964年，“葭县”改为“佳县”，原因就在于“葭”字过于生僻。同样，将“鄆州”改为“富县”，将“盩厔”改为“周至”，将“郿县”改为“眉县”，决策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方便民众识记的考虑。曾有人埋怨将“盩厔”改为“周至”，其效果是令人“索然寡味”，但像这样为了地名浅近而做出调整的例子，其实古已有之。比如，陕西的彬县，古为豳国，智者见智。不过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是政党的数量，而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政党体制的适应性。换言之，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政党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至关重要。

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比较、总结世界政党兴衰发展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治党思路，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中国需要一个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党。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执行力强、制度化程度高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N 观点集粹

## 城市规划应重视步行者视角

朱力 张楠在《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现代化中具有先导性、规范性作用。“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创新城市规划理念和方法，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的规划管控。怎样做好城市规划？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图提出的两种体验城市的视角——鸟瞰视角与步行者视角，颇具启发性。在鸟瞰视角下，原本丰富多样的城市被压缩成了一种二维视觉景观，城市仅仅成为一幅包含肌理的图画，而城市的日常生活则消失不见了。

在我国城市空间规划实践中，可以轻易发现这种鸟瞰视角的影

响。这种城市规划视角固然可以给城市空间带来整齐、高效等崭新面貌，但同时也带来了刻板、僵化、功利主义的城市生活模式，甚至会使人忘记城市的本质属性——日常生活空间。因而，推进城市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向“步行城市”回归，强调步行者视角的城市日常生活体验，以更好体现以人为本。

当然，回归步行城市并非对已有城市空间进行根本性重构，而在于注重丰富和方便城市居民生活，让城市空间更加富有人文关怀、生活气息、艺术气质，将以人为本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实践，以承载市民生活与城市文化为目的，塑造和谐友好的城市空间。

应当承认，前些年，一些地方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在包括地名设置在内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出现了不当做法，有的取名轻率，有的以名市利，有的贪大求洋，有的不顾及具体情况，不与群众充分沟通，就设定了一些让人无所适从的地名、路名、街名、建筑名。这些既损害了民众基本情感，实际使用中也出现诸多不便，当然值得反思并切实加以纠正。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搞现代化建设，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回望历史，我们现在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未来，还有数不尽的新事物、新世界等待着我们去经历、去开拓。我们强调继承传统，强调保护文化，强调尊重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不鉴别不判断，文化遗产也不应成历史包袱，要有依据新的实践新的形势走新路、说新话的自信与智慧。故步自封，像孔乙己那样整天炫耀“茴”字有四种写法，决然没有出路。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 N 中外历史

## “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钱乘旦

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一个热词。对于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与其人云亦云，不如正本清源。要搞明白“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必须了解一些历史知识。

## “陷阱”并非修昔底德的本意

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古希腊有几百个城邦，各自为政，相互间经常械斗，战争频繁。但这场战争的震撼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卷入了战争，而且分成两个阵营，即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城邦的一个防御性同盟，斯巴达握有主导权；提洛同盟是在公元前478年由雅典建立的，起初是为了对付波斯，后来变成雅典控制其他城邦的工具，雅典强迫各城邦听命于它，并向其纳税。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爆发，其根本原因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

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冷静的态度，因为在传统上，他们如果不是被迫而作战的时候，他们总是迟迟而作战的；同时也因为他们自己国内的战争，他们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所以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

但大众媒体对这场战争是这么说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急剧崛起震惊了陆地霸主斯巴达。双方之间的威胁和反威胁引发竞争，长达30年的战争结束后，两国均遭毁灭。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接下来的这段话就引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些媒体还特意标明：如此说法“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指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指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很明显，这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修昔底德不是这个意思。在修昔底德那里，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

## “修昔底德陷阱”从何而来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与美国政府过从甚密，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旁征博引：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一样，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

“陷阱”理论在西方走红的弦外之音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将战争

责任归于斯巴达；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是英国这个“现存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才会导致大战。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

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陷阱”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 谨防理论宣讲娱乐化倾向

王礼金 程玉文在《学习时报》刊文提出，理论宣讲是一项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掌握群众的重要工作。然而，近年来却悄然滋长一种娱乐化倾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预防和纠正。

娱乐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搞戏说。主要是宣讲理论时不严肃认真，任性、随意。有的理论宣讲者为了达到“生动、活泼”的目的，用搞笑富人的话语宣讲理论，引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来论证理论；有的随心所欲地解释理论，内容失真失据。二是侃大山。主要是宣讲理论

时脱离主题、转移论题，漫无边际地瞎侃。一些理论宣讲者在正题上轻描淡写，却在旁枝末节上高谈阔论，没完没了地讲一些趣闻轶事。三是秀自我。有些理论宣讲者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渲染一些与宣讲内容毫无关联的个人经历、故事、成就，卖弄自己。

理论宣讲娱乐化具有极大危害性。一是容易造成理论被误解、曲解、肢解，把概念歪曲误导人。二是会消解理论宣讲所应有的宣传、教育、传达公共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等功能、价值。三是容易损害理论宣讲工作的严肃性，损害意识形态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 千万别把大学当高中

杨鑫宇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认为，上大学，对刚成年的学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许多学生和家长的眼中，这似乎不算问题。大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基础教育的延伸，从高中升入大学，不过是从一所学校走向另一所学校而已。

大学教育被称为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究竟“高”在何处，很多人心中没有明确的概念。其实，大学教育之所以“高等”，是因为这一阶段的教育在目的、内容和手段上都和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大学在教

给学生专业知识之外，还承载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那就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逐步走向独立的缓冲期，让他们在这个时期砥砺自我，为学生走向社会铺路开门。这个功能是中学教育所不包含的，也不可能通过学生埋头读书实现。

抱着和上中学时相同的心态上大学，不管念多久，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学生心态”，这才造就了许多在大学里茫然失措，毕业后对社会一无所知，缺乏独立生活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大小孩”。这是每个刚进入大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需要警惕和避免的。